

隐蔽于闹市的红色中枢

朱少伟

最近,上海文化地标之一——天蟾逸夫舞台,经歌迷们翘首以盼两年零十个月,终于展露新颜。在修缮过程中,一段红色往事使每位参与者津津乐道,那就是当年它的隔壁曾有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邓颖超由鄂抵沪,她此行是“受命处理党组织由公开转入秘密状态的许多工作,紧急处理党中央机关迁回上海”的相关事务。邓颖超到达上海后,很快恢复了中共中央妇委组织,并担任书记,委员有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她们开会时以“小姊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作为掩护;按年龄排列,蔡畅是大姐,邓颖超是五妹,所以她就用谐音“伍美”做化名。

同年秋,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翌年春,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从武汉来到申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不久,他又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和开会的场所。熊瑾玎经四处奔波,选中上海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此处紧靠热闹的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三开间门面,楼上三个正在招租的房间临街有窗,可观察马路上的动静;底层仍由二房东周贻生开办“生黎医院”,常有患者进进出出。而且,房屋出入方便,不仅可从“生黎医院”上楼,背后(今汕头路上)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

尽头的楼梯也直通楼上。有戏院和医院的双重掩护,这里很适宜作为党的秘密机关。熊瑾玎的《自传初稿》回忆:“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邓颖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曾装扮成阔少妇模样前往实地察看,她悄悄走上挂有“福兴”商号招牌的二楼,按照约定暗号敲开门后,觉得十分满意,便对以纱布商身份驻守于此的熊瑾玎说:“熊老板,难为你找到这么一个地方。一般人很难想到,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敌人眼皮底下,共产党的政治局会在这里开会办公。”

不久,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福兴”商号正式开张。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来做“老板娘”。朱端绶的《自传》回忆:“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门好,自己看书学习。”熊瑾玎、朱端绶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共同开展艰险的秘密工作;由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他们在数月后便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

邓颖超在“福兴”商号建立了一个党小组,并叮嘱朱端绶:“你和‘老板’编在一个党小组,和我保持联系。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好政治局会议,做好放风工作,也可帮‘老板’管理些中央机关的账目。”朱端绶负责密件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以及各种内勤事务。熊瑾玎以商人身份主持开设了三家酒店,还与毛泽民经营了集成印刷公司,与钱之光经营了一个织绸厂,与曹子建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并参与一家大型布店成为股东,为党提供大量活动经费。

以“福兴”商号名义设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共六大以后的一个红色中枢。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和谨慎,加上隐蔽得很好,这个党的秘密机关在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其间,周恩来、项英、李立三、彭湃、李维汉、李富春、任弼时、邓小平等常到此开会或研究工作。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说:“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这里是中共中央驻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秘密机关。

1981年3月9日,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道:“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是有意义的。”如今,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史迹陈列展已引起了广泛关注。

仓城旧忆

王一峰



说起江南水乡,我想到的不只是烟雨濛濛,绿柳依依,而是古桥、市河与划动的小舟相映成趣,商家小贩的叫卖声、街坊邻里的议论声交织在一起。赶上周末,桥畔都是各色摊贩,人头簇拥,乡音嘈杂,甚为热闹。这是记忆中松江古城一角,也是最具烟火气的一幕。少时的我常常站在高大的古桥上,看两岸人来人往,市河里舟来楫往。那时总觉得蓝天可亲,白云可掬。及至中年后重游,方觉年华似水流。

遥想松郡当年,文脉渊远,万商云集富庶地,楼阁重重烟雨中。如今,所剩的老宅虽残旧不堪,却依然可见当年之繁华。市河两岸,那一长排沿河老宅,粉墙黛瓦高低错落,颇有气势。廊棚下的石阶伸入河中,有人在此洗菜、洗衣,拉家常,这样的市井生活很有亲切感。至今,仓城地区仍然保存着葆素堂、杜氏雕花楼、费驛宅、灌顶禅院、徐氏当铺等许多百年老宅。斑驳的外墙,悠长的小巷,错落有致的屋檐,精美的雕花门楣、木窗、栏杆,在梧桐芭蕉的掩映下,诉说着一段段岁月往事。若逢雨天,撑着油纸伞穿行在秀南街一带,仿若走入戴望舒笔下的“雨巷”。

明代,松江大米已名闻天下。仓城因境内建有漕运粮仓和漕运始发地而得名。此地河道纵横,水系发达,集中了一批名园宅宅和众多古桥。康熙帝二次南下巡游松江,于祭亭上岸,临幸工部尚书王頊龄之“秀甲园”,有感于此间安乐,特御书“蒸霞”二字。当年的市河两岸,门前连街市,屋后闻檐声。在征粮季节,更是人声鼎沸,舟楫频发,渔市闹猛。若

想闹中取静,不妨来颐园一走。园林虽小,一应俱全,出自松江籍叠石大师张南垣之手笔。园中但见清池一汪,凌波三曲,顽石小筑,别有洞天。更惬意者,行至观稼楼前,听一曲水磨悠扬,看一出生死情殇。

仓城20余座桥梁中,最难忘的莫过于大仓桥、跨塘桥和秀野桥。大仓桥,原名永丰桥,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始建于明代,正是松江府漕运史的见证。建成之时,已73高龄的书画大家董其昌作《西仓桥记》,称之“蓄风气,壮瞻视,莫此为伟”。当一艘艘满载松江大米的漕船从桥下出发,驶入古浦塘,取道京杭大运河运往京塘,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

跨塘桥,又称云间第一桥,桥身古朴秀美,桥下波光粼粼。“跨塘赏月”为松江十二景之一,每当皓月当空,轻云浮动,古桥如乘风而去,大有追月而行之势。我仅在桥上看过日落,彼时月亮未上柳梢,夕阳倒影一样迷人。桥虽秀美,历史却悲壮,明末词坛盟主、反清勇士陈子龙在此投河殉难。想当年,松江文人云集,诗酒唱酬,琴棋雅集,尤以几社闻名,云间词派更是独领风骚。

秀野桥,初为木桥,明代改建为石桥,现为钢筋混凝土桥。有人说,即便梦回秦唐,也要从吃开始。此桥盛名,皆因桥下鲈鱼。此处水流急而又湍多,此鱼奇在形似四鳃,喜食鱼虾,栖息于石缝中。乾隆帝品尝后赞不绝口,御赐为“江南第一名鱼”。从此身价倍增。秋风萧瑟时,有一种思念叫做“莼鲈之思”,说的就是吴中莼菜和松江鲈鱼。古大俠在《楚留香传奇》中亦提及秀野桥和四鳃鲈鱼,“天下唯有松江秀野桥下所产的鲈才是四鳃的”。后来河道改建水质污染,野生鲈鱼已近匿迹。所幸今已人工培育成功,可让食客客过过嘴瘾,兼当怀旧。

怀念写信的时光

张志松



收到一家报社寄来的样报,打开信封,取出样报,恍惚间,我忽然想起了自己青葱少年写信的时光。

记得第一次写信,是到离家30多里外的一所初级中学读书的事。那时候,我还是第一次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读书,我答应父亲,到学校会经常给他写信。宿舍安顿好的第二天,放学后,我就趴在床铺上,展开信纸,饱含感情,非常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给父亲写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爸爸,你好,我到学校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地读书的……满满地写了一张纸,然后,郑重地把信纸折好,放进信封,贴好邮票,趁着宿舍里还没熄灯,溜到学校对面的一家邮局门口投进那绿色邮筒里。想象着这封信两三天就到了父亲的手中,父亲会兴奋地扬着信封,喜滋滋地对母亲说:“看,儿子来信了。”说着,便磕磕巴巴地念给母亲听。

初中读书的三年时光里,我经常给家里写信,可父亲却很少给我回信,难怪父亲,父亲识字不多,一直握惯了锄头,根本就不会写信,即使叫他写信,写得就像鬼画符似的,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如果实在想回信了,父亲就找邻家的叔叔帮忙写信,无非问的是,钱够花吗?在食堂里吃得饱吗?你只管读书,家里的事情别操心了等等。有次,临近中考,复习紧张,我一连有十多天没给家里写信。有一天,我到学校食堂里打饭,猛然看见父亲扛着白色

的蛇皮袋朝我这里走来:“你这孩子,多长时间不给家里写信了?你妈不放心,就叫我过来看看你,这不,还给你带了鸭梨、烧饼,还有两瓶酱腌菜。”我接过父亲的蛇皮袋,酸楚地说:“爸,对不起,我……”父亲大手一挥,说:“没事没事,看到你,我就放心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塞到我手里,说:“这钱是给你买信封、信纸和邮票的,记得要经常给家里写信呀!”我含着泪水,拼命地点了点头。

说实话,这短短的三年,我已经记不清给家里写多少封信了。多少年后搬家,整理抽屉时,发现我寄给父亲的信,全都一封不少地放在抽屉里,怕有五六封之多。回想:我在给父亲写信的时候,仿佛看到父亲顶着烈日,汗如雨下地在菜地里浇水;仿佛看到母亲迎着凛冽的寒风,吃力地挑着大白菜……每次写好信,我就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地学习,珍惜现在的读书机会,努力考上县里的一所重点高中,这是对父母最好的安慰和回报。后来,我因为爱好文学的缘故,除了给父亲写信外,有时候也给各地报刊写信。说白了,就是给各地报刊投稿。当我辛辛苦苦地爬格子成稿后寄给各地报刊后,那种急切渴望的心情,是非常煎熬的。我也不知道投出去多少稿子了,只收到一封上海《故事会》杂志社的回信。初次看到印有《故事会》杂志字样时,我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以为是编辑老师寄来的一张用稿通知单。当我打开信封时,一张薄薄的纸张映入了眼帘:尊敬的作者你好,你寄来的故事《饭碗》一文,恕不采用。我顿时从冰凉到脚,差点儿站立不稳。尽管如此,我也没有放弃,继续努力,中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我的一篇散文《情系太阳帽》发在地级市的《泰州日报》上,可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

后来,我曾给初恋女友写信,也曾给老师、同事写信,更多的则是给父亲写信。无论是在远隔500里外的上海,还是在千里之遥的湖南,每个星期,我都会给父亲写信。每次收到父亲的回信(是在家的弟弟帮忙写的),字里行间,我会感受到了父母浓浓的爱和牵挂,一直到家里有了电话,写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再往后,有了手机,就再没给家里写过信了。

屈指一算,有十多年没写过一封信了。怀念写信的时光……

生活茶座

盛庆书



▲永丰沪剧团队沪剧《雷雨》群像
▶永丰沪剧团队沪剧《罗汉钱》群像



吴月萍和永丰沪剧团(下)

一心要与沪剧为伴的吴月萍,在此后十多年枯燥的文印室工作中,大形势及小环境让她不得已将沪剧“论”为了业余爱好,但她没有放弃。10年间,她从未间断过参加各类沪剧表演、大赛,“功力”从未荒废。不仅如此,吴月萍还结交了越来越多和她一样痴迷沪剧的“同道中人”,这让她萌生了组建一支业余沪剧队的想法。

2002年,吴月萍吹响了重组当年仓桥乡文艺小分队的“集结号”。响应者中包括了吴月萍的哥哥吴玉龙和当年《三朵花闹婚》的“两户半”人家中的王桂英、王桂珍,以及王瑞华、张美华等。在长达四五年的“筹备期”里,吴月萍一边带着已加入的队员开始了每周的固定排练,一边继续“招兵买马”,队伍逐步增加到二三十人,这其中,有很多“好苗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沪剧队的“台柱子”,2007年,永丰沪剧沙龙团队正式成立了。

很快,又是四五年过去了,永丰团队每年都要排练一两台节目在街道内外演出数十场,积累了相当的演出经验,在观众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也有了更高期盼。此时,吴月萍他们很想通过排演一台经典戏,来更好地提高团队的艺术水平。

一次,趁沪剧名家马莉莉来永丰讲课时,吴月萍向她表达了想要排演整出《雷雨》的想法。马莉莉十分惊讶,提醒她:《雷雨》这出经典剧目,对演员的唱功和表演技巧要求相当高,连区一级的文艺团队和一般民营剧团都不敢轻易尝试。吴月萍表

百年沪剧与松江(三十)

周平

示,正因为排练高难度的剧目,对爱好者个人表演功底,对沙龙整体水平的升级都大有益处,所以,团队全体成员都想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于是,在半年多的时间中,团队相关成员几乎每天晚上和周末都坚持排练,导演雷磊对演员们排练的一言一语、一招一式,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时不时地亲自示范,直到演员从内心真正体会到这样唱演、神情表现的必须,使得排练效果有了很大的提升。

首演那天,下午1时才开始的演出,有居民上午8时就来“占座”,更有居民专程从小昆山等地赶来,到演出开始前,原本只能容纳200余人的礼堂内已经挤了三四百人;没有座位,有的居民就自带板凳,有的甚至站着坚持看完演出。演员们的唱演也不负众望,无论是吴月萍的繁漪、吴银芳的周萍、周伟康的周朴园、储丽萍的四凤,还是王桂英的鲁妈、吴玉龙的鲁贵、张文华的鲁大海、沈忠的周冲,都是这么到位,个个栩栩如生,让居民们大呼过瘾。

亲临现场观看的马莉莉在观后感中说:心里话,永丰团队近三个小时的《雷雨》,真不亚于区县剧团和民营剧团,水平很高!一个街道沙龙能排出如此高质量的大戏,太不容易了,要知道这不是其他戏,是经典《雷雨》!

两年后,永丰沪剧沙龙队又邀请上海

沪剧院青年团团长洪立勇来帮助排演了沪剧经典《罗汉钱》全剧。他们在舞美方面继承了传统戏曲的精炼美、虚拟美的优点,决不要豪华来夺眼球。不仅吴月萍等一批主要演员,尽情发挥唱、演之长,就连那些非主要角色,比如出场总共才几分钟的张美华,也把一个几乎是排不上号的角色——王老太,让观众们看后牢牢地印在了脑海中。

沪剧名家马莉莉对演出再次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永丰沪剧沙龙队《罗汉钱》那接地气的特有的泥土气息,与该剧十分吻合。她还希望沙龙队继续排演《芦荡火种》,“这样,丁老师的三出代表作你们就都有了!”

2016年11月,永丰沪剧沙龙队不负马莉莉希望,圆了沪剧经典“三级跳”的梦想,如期推出了是娥老师另一出经典代表作《芦荡火种》,成为区内唯一一支用五六年时间接连把这三台大戏高质量搬上舞台的团队。

随着团队的名声远扬,越来越多的区外机构也发出邀请,请永丰沪剧团前去交流演出。2017年9月,他们首次应邀去太仓,演出了《罗汉钱》《芦荡火种》。第二年,再次应邀去演出了《雷雨》等,在太仓掀起了“永丰沪剧风”。

说来永丰(仓城)与沪剧(淮黄)似乎向



每次开车经过“佘山世茂洲际酒店”,就会想起深坑的许多往事。

当年我下乡到横山山前二队,老支书告诉我:“横山脚下的横山塘东面,是我们天马公社的采石厂,现在各条战线的建设热气腾腾,对石料需求非常大。采石厂日夜开工,晚上会有些声音传过来的,有事情过去也要小心……”

果真如此。夜深人静时,东面偶有爆破声响起,更有隆隆而低沉的轧石机声音传来,时间一长,就成“催眠曲”了。

一次“大忙”开夜工回家,老支书让我去各队发通知,内容是第二天一早在大队部开队长会。我们大队11个生产队,有10

深坑里的灯光,又亮了

雷黎光

个队是围绕横山的,唯独5队在横山东面的采石厂旁。那晚大地漆黑一片,我从5队队长家里出来时,一股好奇心驱使,向采石厂靠近。黑幕下的采石厂,从坑底到地面场地,挂着许许多多“小太阳”(1000支光),灯火通明,犹如白昼,工人忙碌着,几台隆隆的轧石机,拼命似的吼叫着……

我舅舅是原天马公社永丰大队的,就在采石厂上班。我常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还时常“三班倒”。一个酷暑的下午,我去采石厂看舅舅,可他正好在几十米深的坑底干活。坑底刺眼的太阳光,青石的反射

光,震耳的轧机声,石灰滚滚,仿佛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我在许多身影中找到舅舅。他戴着草帽,手腕上扎着黑黑的已看不清原色的毛巾,湿透的衣服紧贴在一块块发达的肌肉上,正挥汗如雨地用铁皮“盆箕车”接下轧石机吐出的各种规格的石料,满车后,推出来,由卷扬机拉到地面堆场。旁边,一大桶麦茶,几个大碗,好几个工人正仰头狂饮着。

“老黄”,我的一位知青大哥,老三届,胖胖的,常常习惯性地推一下自己的黑框眼镜,一对“小眯眼”让我“笑话”他,你太像《小兵张嘎》里面吃了西瓜不付钱的副

官……他在采石厂负责宣传工作,农闲时,我会去他那儿,他一脸笑容而自豪地讲给我听:“我们采石厂,是公社的交税大户、利润大户、用工大户,对公社贡献最大!石头质量好,生意好得不得了,来不及供应。大石块、小石块、四六八、瓜子片、石粉……你看西面,来要货的大小大小小船只,带了支票、钞票,把这条河塞得满满的,要等上几天才能提到货啦!就是我们的工人特别辛苦!”我惊讶,问:“这些石头都干什么用?”老黄滔滔不绝:“他们装回去,筑路修车、填路面、造仓库、建猪舍、粉墙面……用处大着呢!”

上世纪末,开采停止,“深坑”的灯光,熄了。

2018年,世界建筑奇迹发生!一座五星级大酒店坐落“深坑”。“深坑”的灯光,又亮了!